

廖世承素质教育思想试探

严 军

我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、中等教育学家廖世承,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五十余年,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。在素质教育方面,他的许多论述和实践经验,对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,仍然具有一定借鉴价值。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,供研究素质教育的专家和广大教师参考。

(一)

所谓“素质教育”,是指学校教育按照一定目的、计划,合理安排各种教育和教学活动,使学生在德、智、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,形成良好的素质结构,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公民,为各行各业造就有用之才。廖世承在理论上充分肯定教育和训练对发展人的素质的重大意义,并在办学实践中把这一思想贯彻始终,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。他指出,教育的任务是在于培养人的良好素质,抓住素质教育,才是抓住教育的根本,无论初等教育、中等教育、高等教育、抑或职业教育、社会教育,都是如此。如果偏离学生素质的培养,仅仅为了升学或就业,这样的教育是片面的或是短视的。而如果能从提高素质着手开展教育活动,学生素质得到提高,升学、就业也就水到渠成。当然,教育既有各级各类之分,素质要求自然也有其不同层次。这就是说,各级各类教育对素质的要求是会有一定区别的。

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,总是具有一定目的。这个目的就是教育要造就什么样的人。通常,一定的教育目的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教育家提出的。但它不是主观产生的,而是来自社会,是受一定的社会政治、经济制约的。一个国家的政府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、经济需要,提出自己的教育目的,一个教育家提出教育目的还要受他自身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影响。

总之,一定的教育目的是一定社会政治、经济的反映。廖世承生当外侮频仍、主权沦丧、民族危亡之秋。自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,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开始,觉醒了的中国人四处寻找救亡图存、自强发展之路。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,一些有识之士打开了眼界,认识到传统的封建文化、封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桎梏,也认识到教育在救亡图存、富国强兵中的作用,认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对振兴民族、改进社会的重要意义。于是,一些爱国思想家、教育家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,以挽救国家。廖世承也是这样一位教育家。他在谈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时说:“教育与社会息息相关。有良好之教育而无良好之社会,则成效难睹;有良好之社会而无良好的教育,则振兴不易。”廖世承认为,旧中国教育不上轨道,根源在于政治腐败,外敌入侵,经济落后。他面对当时社会和教育的状况,痛心疾首。在《今后中学教育的问题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们知道教育的现状和社会的背景息息相关。现在中国的社会情形怎样?举凡前代所谓亡国的景象,现时几无一不备。我们试看列强窥伺,蚕食鲸吞,不是前代所谓外寇侵略吗?军阀跋扈,自相残杀,不是前代所谓强藩割据吗?其它如土匪的绑票,天灾的流行,政治的腐败,人心的浮动,更为前世所希有。处这种时代之下,希望一般从事教育的人,把我们的国家放在四平八稳的地位,真是谈何容易。急于收效的人们,因此大唱教育不能救国的论调,其实中国土地如此广大,人口如此众多,政治如此黑暗,人心如此陷落,社会现象如此复杂,专凭教育救国,哪里救得过来?但是除掉教育外,要另找一条简易可行的救国途径,又向哪里去找?”廖世承认为,在当时社会,教育救国是一条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途径。他说:“一个国家军备的优劣,财富的盈亏,政治的消长,实业的盛衰,文化的升降,直接或间接都与教育有关。”如果教

育不发达,公民的基本训练不充分,就难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。又说,我国最吃亏的是结党营私,不顾大局的人太多,而忍辱负重,积极建设的人太少。青年学生一出校门,就想得到一个优越的位置,享受人生的幸福,终日萦绕于名利两途,没有一个人肯殚尽竭力、敝屣荣华。廖世承指出,今天在校的学生,就是未来的国民。他们的素质如何,是忍辱负重、殚精竭力、积极建设,还是为个人名利地位,关系到国家的兴衰、社会的进退、民族的隆替。学校的任务就是把青年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知识、体格强健、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。只要个个青年都成为这样的国民,具有革新社会的精神,抱着民族复兴的决心,就可推进社会向前发展,国家的发达、民族的振兴,就有希望。

廖世承热爱教育事业,是出于对国家、民族的热爱。他希冀通过教育培养健全的现代国民,以改造社会,转变社会颓风,振兴国家,其愿望是应该肯定的。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缺乏深刻的认识,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,只是主张通过教育,从培养健全国民着手,救国救民,无疑是他思想的局限。

(二)

廖世承从他的造就健全国民的教育目的出发,对理想的健全国民所应具有的性质作了全面的论述,并据以提出:“教师的使命,不在教书,在教育整个的青年”这个著名的论点。所谓“整个的青年”,就是将学生的全部身心作为整体,使之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,而不是肢解式的仅仅注重某个方面。这对改造当时的学校教育有着明显的作用。针对当时学校偏重知识教学,忽视道德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倾向,廖世承指出,“青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,不论德育、智育、体育,都应该在这个时候树立基础。”唯其如此,学生毕业后,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,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。为此,他对德、智、体三育,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,很有创见的观点。

廖世承认为,一个健全的国民,必须具有完美的人格,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,健康的身体。学校对学生的德、智、体三育应同样重视。他说,“对于学生的品性和健康,应与知识看得一样重要。”“学校培养出来的人,有了体力,有了智慧,还嫌不够,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品性。”因为“一个人有了知识,没有品性,非独无益社会,并且造成种种罪恶。”他针对当时“三育”分离的偏向,指出“过去的学校,把教学看作一件事,训育看作又一件事。因此,教师上课只知教书,对于学生

的行为方面,思想方面,丝毫不去理会。学生在校只知读书,对于体格的锻炼,情感的陶冶,视为次要的事。这种偏想,由来已久,危害甚大。”廖世承针对当时“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”的观点,对德、智、体三育的关系,作了辩证的论述。他说:“其实,智育之中会有德育,体育之中亦会有德育,舍智育体育而复言德育,则德育为空虚。”他认为,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,体育实为德智二育的基础。德、智、体三育相互渗透,相互促进,是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,也是教育的规律。

廖世承根据他造就健全国民的目标和德、智、体三育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,在教育实践中对学生提出“强身”、“力学”、“敦品”三个要求。

第一是强身,提高健康水平。他说,“世界上最大的痛苦,莫过于怀抱大志的人,学问有门径,身子不帮他的忙,使他不能有所作为。”他列举德、意、苏各国注意国民体育的种种做法和经验,语重心长地指出,“现在的民族战争,是体力战争,智慧战争,人格战争。体力不发达,不必待两军相见,民族的胜负已可断定了。”因此,他对学校体育极为重视,明确提出“体育宗旨,原在提高全体学生之健康程度,不在训练少数选手”的主张,要求学校体育特别注重一般身体孱弱、运动兴趣不强的学生,体育教师要伴同训练。他说“体格好了,不特作事效率增加,并且疾病减少,性气平和,生活也感到无穷乐趣。”廖世承重视学校体育,在领导国立师范学院期间,还提出“体育第一,德育第二,智育第三”的口号。这在旧中国是难能可贵的。西方列强一直视中国人为“东亚病夫”,廖世承重视提高学生身体健康,对增强国民体质,改变“东亚病夫”的形象,对国家、民族有着重大意义。必须指出的是,廖世承把体育放在第一位,并不是认为体育高于德育、智育,而是从身体是道德和文化知识的载体,没有健康的身体,遑论道德和智慧这个角度出发,强调其重要性。廖世承同时告诫学生:“诸位正在青年,要锻炼体格并不困难。不过有一点要牢记,血气未定的青年,最怕的是为了一己的身体,毁坏一己之精神。”

第二是力学,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。廖世承认为,学校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,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水平,是学校素质教育的中心。当然,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结晶的知识,是十分丰富,十分广泛的,学校教育只能把最基本的知识传播给学生。廖世承说:“盖基本知识最重要,苟基本知识缺乏,将来习职业,习师范,升大学,均不能有高深的造诣,亦不

能为社会谋幸福。”廖世承主张加强基础理论,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训练。他一再强调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的重要性,同时又要求学习“活”的知识。他认为,真正的知识并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,而是“活的知识”。在《毕业会考究有什么价值》一文中廖世承写道:“这儿所谓知识,是指活的知识。所谓活的知识,须能应用于实际问题,须能适应个人的需要。”所以,学生也须知道,“学习的结果,并不是记忆的事实,回答的词语,做的习题,写的作文,谈的书籍,或及格的学程。这是材料,这是练习,这是方法。从这些材料、练习、方法里边可以得出真实的结果。能应用于实际生活。”这才是真正的知识。如果学习只是“复述教材,并不一定表示了解。要创造一种新的境界,才能试验其了解和能力。说得透彻一些,只有生活上发生的实际,才能试验学习的结果”。从这个观点出发,廖世承十分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,主张“应使青年多操作,多用手、多用脑。”他批评当时学校教学忽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,指出“现时学生在课室内耳用得最多,口眼用得很少,手可以说是用得最少了。”如此下去,中学生要变成双手无能的人。基于同一道理,廖世承反对“以分数为知识的代表”。他痛感“分数主义”的危害。学生看见多记事实,多背词句,便可得到高分,心力就转到分数上去。只要能多得分数,就死记硬背,甚而不惜采用抄袭、欺骗、作弊等手段。久而久之,学生不但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,反而养成许多坏习惯,损害了品性。既违背了智育的目的,更达不到培养健全国民的目标。

廖世承认为,学习基本知识对于发展智力具有重要意义。他一再强调,学生要发展智力,发展思维能力,进行独立思考,必须掌握广泛的基本知识。同时,廖世承还认为,文化知识与一个人的品行有着密切联系。因为,一个人缺乏文化知识,会导致精神空虚,而精神空虚往往是一个人走上歧途的根本原因之一。他说,不学无术的人,不可能成为幸福的人,对社会对国家是无益的。

第三是敦品,即磨砺品性。廖世承认为,学校第一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,让他们学会做人。道德教育的内容,主要包括:高尚的理想、美好的情感、纯正的品行节操、良好的习惯、合群意识、纪律意识和勇敢精神,而最重要的是培植纯洁无暇的人格,树立“为大多数人谋幸福”的人生观,这种人生观是一个人的“中心信仰”。他说:“青年最大的危险为茫无宗旨,

随波逐流。”“青年要希望成功,必先养成良好的理想。青年能认定一己的生存,不专为自己的享受,而应对于社会国家有相当的贡献。”为此,他提出:“培养理想为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”这一命题。廖世承认为,“用外界的力量造成的习惯,情势变迁后,随时有破除的可能,唯心中所藏的理想能发生永久的影响。”这个理想就是为天下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心信仰,也就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目的。他说:“各人的志趣不同,能力不同,主张当然不能一致。不论你的主张如何,只要你最后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增加幸福,那就可以说是适当的中心信仰。”

培养纯洁无瑕的人格,是廖世承德育的最高目标。他说:“人生最珍贵的是纯洁无瑕的人格。”廖世承认为,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,是由于政府腐败,政治黑暗,国力衰落,结党营私,不顾大局的人太多,而忍辱负重,积极建设的人太少。只要大家能把眼光放远一点,多数人能保持纯洁无瑕的人格,便可挽救社会颓风,解除困难,求得中华民族之生存。他认为学校应该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,培植具有纯洁无暇人格的学生,亦即未来的国民。所以,他要求学生“敦品”,勉力造就这种人格,他说:“要知人格健全,不单是国家社会蒙其益,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。”

中国历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。但伦理道德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。作为做人准则的人格也是如此。廖世承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家,他根据自己的爱国立场和人生价值观,继承我国传统美德,提出健全国民的人格标准和人格教育内容。他所倡导和所要培植的人格,包括见利思义、见危授命、舍生取义,民族气节和风骨,不为一己之享受,能与民众同甘共苦,坚强的信念、顽强的毅力、勇敢的精神,等等。也就是健全国民所应具有的思想道德素质,其核心是为国为民而牺牲小我。廖世承认为,人是不可能没有缺点和过失的,但只要能够为国为民而牺牲小我,就可以说是有了纯洁无暇的人格,与这种人格相对立的是那种“为一己之享受,不顾大局,临财苟得,临危苟免的人。”这种人他是深恶痛绝,所要摒弃的。廖世承造就健全国民的教育信念,基于他的民本思想。其全部出发点和归宿,充满着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。

(作者系上海师大高教研究所研究人员
邮编:200234)